

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

2012年

古 耜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

2012年

古 耜◎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2年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 / 古耜主编.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500-0415-3

I. ①2… II. ①古…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3636号

2012年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

古 耜 主 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赵 霞 王彦山
美术编辑	方 方
制 作	马 赟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21.7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415-3
定 价	35.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2-15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4736 邮编 3300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王 蒙 欢喜、忧患、未来 1-⊙
- 汪 晖 “我有自己的名字” 8-⊙
- 萧功秦 发展公民社会之中国路径 18-⊙
- 樊 星 为民族主义一辩 28-⊙
- 陈平原 六城行 36-⊙
- 史铁生 昼信基督夜信佛 47-⊙
- 张 炜 对不起它们 61-⊙
- 南 帆 情为何物 65-⊙
- 梁 衡 心中的桃花源 81-⊙
- 王安忆 教育的意义 98-⊙
- 雷 达 论疼痛 101-⊙

- 方朝晖 重建核心价值的三条思路 104 —⊙
- 郭文斌 走进安详：找回中国人的生存意义 110 —⊙
- 许博渊 对中国饮食文化的思考 131 —⊙
- 张维迎 理念决定未来 140 —⊙
- 王开林 哲学家的生活态度 147 —⊙
- 冯天瑜 对东亚智慧现世意义持平允态度 155 —⊙
- 李敬泽 春秋的老实人和天真汉 160 —⊙
- 唐翼明 换个角度看《水浒》 168 —⊙
- 张承志 体制外的意味 174 —⊙
- 孙 郁 奴性语言及其他 183 —⊙
- 李洁非 我们应该如何读史 193 —⊙
- 谢有顺 当下大学面临的人文危机 203 —⊙

- 王开岭 那些消逝的歌 216 -⊙
- 吴 靖 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 226 -⊙
- 王充闾 解脱 235 -⊙
- 丁 帆 歌者因何而歌：赫尔岑的自由观 248 -⊙
- 鲁枢元 陶渊明PK秦始皇的随想 256 -⊙
- 谢 泳 怎样理解舒芜 263 -⊙
- 祝 勇 残局 269 -⊙
- 张宏杰 史书里的兴衰 290 -⊙
- 王 龙 江山何处奏管弦 303 -⊙
- 马晓丽 遥想长城 314 -⊙
- 赵荔红 暴力与恐惧的三种写法 328 -⊙

欢喜、忧患、未来

王 蒙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悲情与急切。以我的77年的经验，我体味了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亡国屈辱、国民政府的贪腐与无能、旧中国的奄奄一息、新中国建立的凯歌阵阵、终于“站起来了”的欢欣希望、连连政治运动的昏头昏脑、“文革”的动乱折腾的五光十色，种种种种，可能比活在哪一国也热闹、多变、壮怀激烈。我要毫不犹豫地说，只是“文革”后，中国才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我们无法不珍惜这一点。

能不欢喜吗？老作家巴金老师，尽管他也有许多遗憾与未酬之愿、未圆之梦，生前他与张光年在一次中秋泛舟西湖之时，也抒发了他由于中国近二三十年的迅猛发展而体会到了欣悦之情。光年告诉我的巴老的原话是：“中国的发展，让我们的腰能直起一些来了……”

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富民政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系列在邓小平等同志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信念与采取的路线方针，已经成为全民的共识与胜利的保证。

有许多发展令国人与全世界欢呼。但是，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其他次要矛盾的迎刃而解，恰恰可能是其他矛盾的凸出乃至尖锐化。

最明显的就是官员的贪腐与弄虚作假。在各种生活消费品凭证的时代，贪腐问题不大可能浮出水面。现在可了不得了。老百姓中的有关议论、传闻、小道消息，无边无沿，惊心动魄。越是缺少有效的有充分公信力的与透明的监督机制、信息报道与舆论平台，传说越是会变得比事实可怕十倍。

弄虚作假的问题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我们自古强调的是秩序，是和谐，是德行，是人际关系，是父慈子孝，是君明臣忠，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勿为已甚与中庸之道，是统筹兼顾与保全面子，是人们的主观感觉的最大限度的满意化与合理化。但是我们缺少严格的求真的传统。《红楼梦》中平儿处理玫瑰露失窃事件，拉出宝玉顶缸，掩护了彩云，避讳了探春，停止了追查，令世世代代的读者叫好，却完全是不顾事实真伪。

各种禁忌与避讳，这可以理解，但不是常用的办法。在网络时代，禁忌、避讳，捂起来，一时的奏效顶不住长远的后遗症。

老百姓当中有一个词，叫做“黑”。他们认为在冠冕堂皇的背后，有某些见不得人的黑暗、无耻与丧尽良心。当然百姓们传的东西不见得靠得住，何况我们还不能排除充满敌意的造谣与诽谤一刻也没有停息。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含糊，只能增加透明度，尊重知情权，尽可能地减少“黑箱作业”，让更多的阳光照进我们的决策与选择的过程、管理与辛苦的过程。例如有些县，传出了买官卖官的价目表，只有让更多的人知道选择任命的过程，才能摒除买卖官职的街谈巷议。罪恶止于阳光，这是句很好的话。

贪腐的问题不仅是金钱与经济的问题，更是公平与正义的问题。关系学压倒了真才实学的地方，啥事都难办。

上面要的是长治久安、不折腾；百姓要的是天下太平、敬业乐群、安居乐业、温饱小康、自由呼吸。这二者本来是搭调的。但是贪腐与躲避群众的官僚作风大大地离间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现时的党群关系已经与老苏区时期、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大不相同了，我们不能不正视不研究。一个党或一个政治理念与权力系统是怎么胜利的？靠的是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个

朝代或一个政治力量是怎么失败的？最要命的还是它们与人民群众的渐行渐远，一直发展到互相抱怨、互不信任、互相蒙骗、互相对立。这是最大的危险，这是最大的令亲者痛而仇者快，这是最大的自我戕害。毛泽东时代有一句很尖锐、很有力量的话：自绝于人民。自绝于人民就是政治上的自取灭亡。

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叫做统一战线，叫做协商民主，叫做政治协商，叫做有什么大事大计，由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邀集各党各界各路社会人士座谈征求意见。这很好。这样，一、避免了决策的单一化运作可能有的片面、匆忙、顾此失彼与捉襟见肘，注意了在中国这样的国情不一般的大国古国做任何事情都要统筹兼顾、照顾方方面面、把握分寸火候。二、避免了把人民内部矛盾激扬化、炒作化、对决化，避免了国家陷于分裂、失衡、恶性冲突、动乱不已。

协商民主的前提是承认界别、层次的多样性，承认利益、境遇、思想见解政治诉求的多样性。承认差别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前提。大家本来就铁板一块地一致，还统什么战？承认某些统一的大原则又是保持多样性差别性的前提。如果根本不承认宪法、不承认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承认改革开放开始的新时期的宝贵进展，差别就会变成分裂、变成割据、变成内战、变成投机分子野心家的火并借口。

包括我们讲指导思想的统一性、非多元性，也是以承认被指导的思想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如果说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如果说这样的指导思想的确立有效是针对指导自身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如果说统一的指导思想的功能是自我指导，是将前提当成结论，以主语作宾语，那是说不通的。

正因为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思想，有爱国主义者，有民族主义者，有各种不同的宗教信徒，有泛道德论者，有泛爱论者，有实业救国论者，有国粹崇拜，有西洋文化崇尚，有唯美派，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有文化相对主义，

有实用主义，有精神至上派，有文化至上、艺术至上、真理至上、信仰至上、奉献至上、爱情至上、趣味至上，也有及时行乐者、拜金主义者，有奉公守法但追求个人与家室亲人的利益的最大化者，也有狂热地追求立德、立功、立言即个人的流芳百世但并不拘泥于某种特定政治派别的人，有追求专业成就而宁愿与政治拉开距离的人，有提倡为知己者死、为悦己者容的男男女女……正因为不可能将以上的种种都培训改造成清一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家，才需要指导思想的统领与发挥影响力。再说，即使口头上都服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会分成各种学派、派别、山头、门类，仍然各有各的脾气与关注。没有社会的多元性的现实，就没有强调一元化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与必要。

有歧义才有讨论的必要，有不同的见解才有妥协与和谐的必要，有碰撞和摩擦才有强调团结的必要，有挑战有为难之处才见智慧与水平，有混乱才有认真进行法制建设的必要与针对性。

有权威才有认真的质疑，有诚意才有认真的议论，有共识才有各抒己见的空间，有合作才有各自的充分发挥，有统一的大目标才有异彩纷呈的各类发挥与表述。

这样，就会有真正有效的、代表性足够的协商民主，就可以大大减少表面上颂歌盈耳、紧跟照办、竭诚服膺，实际上各种矛盾冲突越积越多，直到最后恶化失控消解的非理性非良性后果。

毛主席时代就说过，要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没有不同的声音岂不成了自己与自己的亲密门徒的聚会，岂不成了关上门听自己的回响，岂不成了自言自语、自拉自唱？

我们在“文革”后非常强调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在听到知识分子歌功颂德的表态以后会喜形于色，底下的事就都好说好办。同时我们确实无法不厌烦那些对世事国情一知半解，就汲汲于全盘西化，实际上要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指手画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物。

问题在于，除了经常出入于高层政治活动的，其合作精神与忠心耿耿、其言听计从与热爱拥戴绝对不下于中共成员中共干部的知识分子、各界人士，以及与上述人员完全相反的，即意在另起炉灶、唯西是瞻的人员，还有打着极“左”的旗号，想着在中国再搞一场“文革”的人士以外，除了这些非常鲜明非常坚决、我们非常中意或者非常警惕的人士以外，还有大量的中间状态的人。他们无意于搞什么异端异议，也无意于无保留无距离地参与政治生活。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相比，与中央的文件和中央的精神相比，他们更关注的是民生、科技、文化、艺术、乡村建设、世道人心、积德行好、经济效益、实业救国、著书立说、学术贡献、获得国内大奖尤其是国际大奖、自成一家、保持清高与风度、全世界同行人士的尖端成就，是倾向于某一种学说，但又更多地注重自己的专业、行业。我们应该坚持一种有容乃大的胸怀，发扬一种闻过则喜的气度，追求一种厚德载物的美质，使我们的统一战线、我们的政治协商、我们的协商民主有越来越多的干货，有充实的内容，有争论也有妥协，有小异也有大同，有各执一词也有平衡协调。这样的协商政治、协商民主，确实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对于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重大贡献。

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成了一个相当敏感的词。其实政治体制改革是咱们自己提出来的，是小平同志最早讲的。问题在于，不可以把政治体制改革看成削弱党的领导，也不可以把加强党的领导看成躲避或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改革的结果是使人民大革命的结果付诸东流，是使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是中国的动乱与分裂，是亡党亡国亡头，那当然是一个悲剧而且是全中国全世界的大灾难。

另一种态度呢：硬是抱残守缺、无视如胡锦涛同志讲的四个考验与四个危险，以捂盖子为有效法门，最后仍然会混不下去的，最后仍然是难逃孕育与积累下可怕的大不幸、大灾难。

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170多年，《共产党宣言》已经问世了160多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已经度过了94年，苏联解体已经是20多年，中国革命胜利已经是

60多年，毛泽东去世已经30多年，邓小平去世已经14年，我们必须敢于面对现实，面对世界、东方、中国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忧患新机遇。我们一定要有条不紊地、有序地、理性地研讨我们的下一步的走法。拖延不是战略，回避不是方法，炒作不是好心，闹腾只能自戕。不争论是不能让全国人民免于政治的歇斯底里和政治纷争，不争论不是不讨论不思考不研究不未雨绸缪。

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现在的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体量巨大，而且执政经验如此丰富。让这样的党中央解答一切问题其实是不可能的。社会要能统，也要能分工，各安其业，各行其道，各守其规，各得其利其乐。在革命胜利与内外斗争的高潮中，我们这里常常会有全民“肃反”、全民批判胡适、全民讨论《红楼梦》或《水浒传》、全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全民呼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盛况。随着社会的正常化，执政意识的明朗化，我们会认识到各安其位的社会是稳定与和谐的社会。动辄全民陷于政治上的兴奋状态、激昂状态、高潮状态，长此以往，绝非吉兆。

一个正常的社会其实很简单：政治家努力谈政治做政治，厨师努力烧好菜，裁缝一心做好衣装，歌星一曲能销魂，作家笔落惊风雨，同时大家都有公民的自觉，维护应有的权利，也尽到自身的责任。

我出生后不久是日本占领军的入侵。然后是国民政府的贪腐与无能。然后是连年的政治运动。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大部分中国的时候中国没有亡，在内战的炮火燃烧了中国全部城乡的时候中国没有亡，在“文革”的混乱使多少新中国的缔造者、新中国的人民友人痛心疾首的时候，中国没有亡。中国的命很“硬”，中国大有希望。中国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有勇气面对歧见与挑战，更加能正视忧患与曲折。成熟的特点是从容、务实、理性、沉着。成熟的标志是少情绪化、少夸张的高调。中国将不会再因为一句话而怒而喜而大轰大嗡，中国将不会再因为一件事情做好了就大吹大擂。中国将不会动不动宣布别人或者自己多么伟大或多么可恶、多么神奇或多么该杀。中国将越来越尊重知识与常识、尊重法理与程序。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政

治、经济与民生，民主与法制和法治，公民、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大局观念、责任观念，自信、自尊与尊重他人，尚文与尚武，道德监督、文化监督、权力平衡与法律监督，意志、人格与理性、科学，个性与共性，全面发展与扬长避短，自由、小康与忧患元元，求胜与共赢……我们需要从头学起，更好地安排妥当。而不文明的乖戾、粗暴、起哄、谩骂、《红楼梦》中赵姨娘式与马道婆式的弱智泼妇巫术方式、个体与群体的政治、社会、道德歇斯底里（点击一下咱们的互联网就知道了），希望终有一天与我们彻底告别。

有人质疑上边领导提出来的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法制结合起来的说法。当然这三者都做好绝非易事。然而，除了这三者，我们还有别的选项吗？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爱国良心，难道不能回答历史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吗？

我们应该做出，也能够做出对于历史的机遇与挑战的英勇与智慧的回答。

选自《中华读书报》2012年06月20日

“我有自己的名字”

汪 晖

2012
年
度
排
行
榜

随笔排
行榜

这是一部关于新工人的著作，也是一部为新工人而写的著作。这部著作由大量的访谈和细心的分析构成，作者通过持久的、广泛的对话，将自己融入这个群体的命运之中，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心去摸索这个群体劳作的身体及其痛苦、欢欣，记录这个群体的灵魂的轨迹。她在记下这些青年男女的语言时，几乎将自己彻底地隐去，力图用他们的语言呈现他们的命运。但在面对其他的力量时，她又分明在争辩：不应该称他们为农民工，也不能将他们等同于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他们是新工人或新工人群体。她不是像许多学者那样，在“代表”打工者说话，她就是从他们的命运内部提出问题。即便当她表述自己的期待时，也像是这个群体的成员的自我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独特的。

与这种“贴近”的描写方法相关，作者对于习用的概念保持了高度的敏感。她有时为一个不经意使用的概念起而辩论，仿佛不是她的研究对象，而是她自己的身份，因误读而受到了伤害。这种反应方式不但没有削弱她的分析，反而增强了她的理论敏感。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这部著作在两组概念上的选择：拒绝使用“农民工”的概念，转而使用“打工者”和“新工人”的概

念；没有使用“工人阶级”概念，而是使用“新工人群体”这个概念。事实上，这两组概念的使用形成了作者观察打工者群体的基本路径或方法论。那么，如果他们就是人们习惯称呼的农民工，为什么称他们为新工人？如果他们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立足于特定生产体系的社会群体，为什么不称他们为工人阶级？一句话，谁是新工人？

新工人无论在行业、地域和待遇方面多么千差万别，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能够被描述的社会群体，即“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这个群体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过程的产物，是后社会主义时期劳动商品化的新形势的产物，也是中国在将自己打造为世界工厂过程中所创制的新的政策、法律、伦理规范、城乡关系和社会模式的产物。这一群体大多出身于农村并与乡村保持着亲缘关系，就像作者描述的那样，他们在城市居住、工作和生活，却视农村为自己的“家”——那里不仅是他们的家乡，而且有他们的父母或者孩子。但作者拒绝了“农民工”这个易于被理解的概念，因为农村的家实际上是一个回不去的家的符号，城市才是他们真正的归宿。在作者所属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墙上，悬挂着一幅《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图表，它清楚地说明了这个群体的历史形成：1978年-1988年，农民在受控的条件下进城打工，他们的名字是“盲流”，至1988年，人数为2000万；1989年-2002年，也许可以称之为“农民工”阶段，其人数达到1.2亿；在这个时期，政府对人口的流动不再限制，但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性政策（暂住身份、遣送风险等）是常规性的；2002年至今的阶段，作者称之为“打工者成为新工人新市民”阶段，人数规模至少在2.4亿以上。在这个时期，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劳动合同法得以实施。打工者在城市工作，盘桓于局促的居室，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工资常常用于在“回不去的农村”盖房子。

作者拒绝了“农民工”这一称谓，这不仅是对城里人的偏见的反驳，也是对政府、学者和打工者自己关于最终会回到农村的幻觉的否定。作者指出：与7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第一代打工者不同，80年代以后出身的第二代打工者大多

没有以务农为生的历史，90年代出生的第三代打工者中的很多人没有种过地，他们在城市出生和长大。打工者工作、居住、生活在城市，他们的后代也将城市视为最终的归宿，但他们心里的或者说符号性的“家”却在乡村——这是衰败中的、无法支撑其生存的、不能为其子女提供未来的“家”。这种介于城市边缘和乡村边缘的状态使他们“迷失于城乡之间”，但从生产、劳动和生存的基本现实看，他们不是农民工，而是新工人，理应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因此，用“打工者”概念替代“农民工”概念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基于对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准确描述。当然，这一描述仍然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即土地制度的因素。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只要户籍在农村，在外的打工者至少在理论上就拥有一定的土地（但实际上很多地方未再进行土地调整，新生代并不拥有土地），从而可以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或经济危机时代重返乡村。但这一前景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和可能的变迁而日益不确定。这也正是有关土地制度辩论的重要环节。

作者关于“农民工”和“新工人”概念的辩证还涉及另一更具有理论含义的命题，即新工人是一个阶级吗？作者在书中没有展开有关阶级概念及其相关命题的理论讨论，但她的用语——新工人群体而不是新工人阶级——却显示了对于这一理论问题的敏感。新工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由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所催生的“新兴的产业工人”群体。由于日渐地脱离乡村和土地，他们已经成为与生产资料（土地）相分离的雇佣劳动者。这是一个完全依托于生产或增值“资本”来维持生计，专靠出卖劳动而不是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取生活资料的群体，他们的祸福、存亡全部依赖于市场对于劳动的需求。就此而言，他们与经典的无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同。如果翻查有关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的研究著作，马上可以找到相关的界定，即“工人阶级是近代大工业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三种近代工业而产生和发展的”，而最初的产业工人“产生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企业里”。仿造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说，新工人群体是中国将自己改革成为“世界工厂”的产物，是伴

随跨国资本进入、中国国有工业转型和民间资本兴起这三种工业的和服务业的潮流而产生和发展的。如果说中国近代的产业工人绝大多数来源于破产的农民，那么当代中国的产业工人则来源于城乡差别日渐扩大时代的广袤乡村。因此，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群体，新工人可以定义为工人阶级。

但作者没有使用阶级概念来定义新工人，而更多地将他们描述为“新工人群体”。这究竟出于什么考虑？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中，阶级意识和阶级政治极为活跃，渗透在政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不同方面，展示出阶级概念的多面性——它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它是结构的，也是政治的。在改革时代，“世界工厂”的建构不仅召唤着资本，也同样召唤着作为商品的劳动。市场化和新工业化的另一种表达就是阶级关系的重构。但恰恰是在这个大规模重构阶级的过程中，阶级话语在中国或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消失了。除了少数案例，试图通过阶级意识召唤新的政治尝试的努力似乎并不成功。就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状况而言，我同意李静君的如下判断，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验与前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承相结合，在中国劳工的部分片断中生产出强烈且高水平的阶级意识。转型研究‘重返阶级’（bring class back in）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不仅适用于中国，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前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适用于工人阶级，也同样适用于资产阶级”。阶级的视野对于理解中国劳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而言，都是必要的。

但同样必要的是：在“重返阶级”的过程中，需要对阶级概念本身加以再分析。这一工作不是本书的主要任务，但作者在使用新工人概念时透露的两点信息值得加以理论总结。首先，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新工人逐渐地形成了某种朴素的主体意识，但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均未构成清晰的阶级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与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他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便并入资本。”并入资本的劳动者只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它没有任何自我意识。因此，工